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 物 传 记

第 十 五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 华 民 国 史 研 究 室 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 物 传 记

第 十 五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 华 民 国 史 研 究 室 编

(征求意见稿)

中 华 书 局

1982年8月

1-258.6
49
:15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物传记

第十五辑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物传记

第十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1982年8月印刷

定价: 0.92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目 录

王金铭	梁旭毅 (1)
罗福星	林其泉 (6)
陈友仁	陈 民 (11)
胡景翼	徐辉琪 (14)
吴克仁	姜克夫 (19)
江 庸	汪仁泽 陈光贻 (23)
何成浚	江绍贞 (27)
孙道仁	黄国盛 (33)
卢兴邦	陈孝华 (38)
罗君强	黄美真 张 云 (43)
李士群	黄美真 石源华 (48)
陈春圃	黄美真 张 云 (55)
范旭东	熊尚厚 (58)
刘国钧	史全生 (66)
武百祥	辛培林 (71)
魏 如	李新辉 (78)
孙多森(附: 孙多钰)	熊尚厚 (81)
吴懋鼎	熊尚厚 (86)
宋斐卿	熊尚厚 (89)
江上达	吴 中 (94)

郑振铎·····	陈福康 (98)
任鸿隽·····	赵慧芝 王 震(105)
王亚南·····	林其泉(111)
刘仙洲·····	黄廷复(116)
吕思勉·····	汤志钧(122)
蒋维乔·····	陈秉仁(126)
廖 平·····	汤志钧(132)
谭鑫培·····	白吉庵(134)
张石川·····	陈 野(139)

王金铭

王金铭，字子箴，1880年6月23日（清光绪六年五月十六日）生于山东省武城县东屯村。他父亲王成耕种祖遗的七亩半地，但不足赡养全家十一口的生活，于是以高利借来一点资本，作买卖土布的小本生意，借以维持全家生计。

王金铭八岁入私塾读书，勤奋好学，课余参加田间劳动，并挤出时间阅读《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培植了他的民族意识。1896年十七岁时，进本地洪瑞钱庄当学徒，备受东家的苛待。由于不堪忍受少东家的欺侮凌辱，不到两年愤而离去。

1897，德帝国主义强占我胶州湾，清政府屈膝投降，激起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翌年，王金铭怀着爱国义愤离开家乡，到天津小站投奔在新军中的大哥王金镜，旋应募加入新军。王为人正直，不染恶习，好学深思，是士兵中的佼佼者。不久，新军扩编，他被提升为棚的副目。他随新军调往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事后被提升为北洋常备军左镇第三协第七标前营左哨哨长。1905年，又调任北洋第五镇第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驻扎在济南千佛山下。1907年，他又被提升为第一混成协第七十九标第一营营副，队伍开到奉天，驻扎于新民府。

王金铭在军中严于律己，治军严明，常以岳飞的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则天下治矣！”作为座右铭。这时候，由同盟会东京总部派来的孙谏声、戴锡九等，已先后打入北洋新军任下级军官，在官兵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策动新军起义。由于王金铭的思想进步，品行端正，足智多谋^①，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他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满书刊，激发了反满思想。王逐渐结识了施从云、冯玉祥等倾向革命的下级军官，于1910年春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公推冯玉祥为会长，以读书研究军事学科为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同年9月，第一混成协与奉天巡防中路独立第一、二标合编为第二十镇，王金铭在该镇第七十九标第一营任营副，后升管带。翌年2月，张绍曾接任第二十镇统制。张原是维新派人物，但对革命持同情和赞助态度，而该镇的参谋

长刘一清则是同盟会员，这就为武学研究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后来参加武学研究会的官兵愈来愈多，风声过大，受到该镇反动军官的疑忌和监视。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王金铭、孙谏声等山东籍的官兵，又发起组织“山东同乡会”，举第四十协统领潘渠楹任会长以遮人耳目。他们利用这种合法的组织形式，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并把外省籍的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吸收为名誉会员，遂把武学研究会的骨干分子，全网罗到“山东同乡会”内。他们分赴奉天、北京、天津、唐山等地联络革命同志，并在唐山设立“山东同乡会”，暗作机关，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9月，第二十镇的一个混成协奉命参加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张绍曾率部从新民府出发，队伍行抵昌黎县之崔庄，正值武昌革命爆发，清廷电令停止秋操，队伍暂驻滦州听候调用。此时清廷计划把第二十镇及第三和第五两镇各一协，与驻奉天的第二混成协，合编为第二军，由冯国璋统率赴武汉攻打民军。当第二十镇官兵得到这一消息后，少数反动的高级军官主张立即开赴武汉与民军作战；一部分军官主张暂时观望，谁胜帮谁；王金铭、冯玉祥、施从云及大多数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坚决主张进攻北京，推翻满清政府。张绍曾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拒绝受命，在滦州按兵不动，并联合蓝天蔚等人，向清廷提出十二条立宪政纲。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他们的立宪要求，于11月3日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接着于11月6日解除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的职务，削去他的兵权，授他为宣抚长江大臣，赏加侍郎衔。王金铭、施从云等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在文庙召开七十多人的会议，挽留张绍曾，力请张率部队起义。这时张觉得与他联合起义的吴禄贞已被刺身亡，自己势孤力弱，决定借口养病，避往天津租界。

张绍曾去职以后，接任第二十镇统制的潘渠楹，为了拆散革命力量，把全镇部队分散驻于葫芦岛、海阳镇、锦州、临榆等地，滦州只留驻第七十九标。七十九标共三个营，第一、二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是坚决革命的，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却是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第七十九标的标统岳兆麟也是反对革命的。这些反动将领密怖侦探，监视革命官兵，禁止他们自由往来。

在敌人的恐怖统治下，王金铭和施从云、冯玉祥等继续领导革命官兵坚

持斗争。王金铭密派郭凤山赴天津，与革命党人王葆真、孙谏声、董锡纯等酝酿滦州起义计划。其时，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等校一批师生组成革命团体“共和会”，派凌钺、张良昆、于树德等人到滦州来运动新军，王金铭等与他们秘密计议，决定于树德打入标部，在标统岳兆麟的食物中暗放毒药，但由于药力不足，岳兆麟未死^②。王金铭、施从云等乃与共和会会长白毓昆及凌钺、孙谏声、熊朝霖、陈涛、高德海、邱子久、王葆真等人秘密商定了滦州起义计划。

12月下旬（夏历十一月初），王金铭潜赴海阳镇，把滦州方面和南方联络的情况告诉冯玉祥，说明白毓昆和王葆真的意见，认为京奉线一带革命实力单薄，主张密约烟台民军由海道自秦皇岛登陆，支援海阳镇和滦州的起义。他们秘密商议了配合民军登陆的起义计划，分头布置，只待民军登陆即行发动。

当王金铭从海阳镇返回滦州的时候，白毓昆早已带着“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之印”，率领二十多个敢死队员，从天津来到滦州。他们认为清廷已经探悉京奉路一带革命同志的活动情况，滦州新军应该提早起义先发制人，以免贻误时机。于是公开宣传反正，顿时全城家喻户晓。王金铭一见大惊，虽然烟台民军未到，还没有与各方联络妥善，起义日期也没有约好，可是起义已经公开宣布，势已无法挽回。他们便于12月30日在北关师范学堂营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部署，并推举标统岳兆麟为北军大都督。他们明知岳兆麟“反对革命甚力，藉此饵而诱之也”^③，会后便通知岳兆麟，并把起义的全盘计划告诉他。当天晚上，他们又以第四十协官长目兵等署名，发出主张共和的通电，分致袁世凯、上海和议代表及顺直咨议局等。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向敌人发出了信号，招致了敌人的防范。

可是，岳兆麟并没有被王金铭、施从云说服，他于第二天早晨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告发，把起义的计划全部泄露。王怀庆立即电请直隶总督陈夔龙转报袁世凯，袁采纳陈夔龙的献策：一面派王怀庆赴滦州“劝解抚慰”、“察其真象”；同时“收束兵队”、“密筹抵御”^④。1912年1月1日，王怀庆奉命来到滦州，采取了软硬兼施、威胁恐吓的手段，以求达到“顺机消弭”的企图。王金铭义正辞严地驳斥王怀庆说：“清廷误国殃民，罪已昭著，海内

志士，同举义旗，凡有血气，皆当振臂兴起，光我民族，……我辈宣言独立，词义正大，心之所至，万死不辞。”⑤他们立刻把王怀庆监视起来。这时，王金铭等人以大都督之职饵诱王怀庆参加起义，王怀庆假装接受，暗中却与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勾结，准备逃走。1月2日早晨七时，王金铭等率部队迎接王怀庆入城就职，王怀庆见军队林立，势不可却，佯允，遂策马前行，张建功随后领军护卫，到了城北紫金山，在张建功的掩护下，王怀庆快马加鞭向西逃跑，瞬息远遁。王金铭、施从云先已入城布置，此时闻讯急迫，已不及。

王怀庆逃走以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推举王金铭为北军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部长，张良昆为秘书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滦州富绅张某为财政部长，凌钺为外交部长兼敢死队长。⑥当天王金铭宣誓就任大都督，正式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王金铭，于十一月十四日，宣布直省独立于滦州。”⑦滦州全城张贴独立布告及“王大都督布告赏罚十六事”以安民心，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发表对内对外宣言，阐明了军政府的方针政策。

本来，军政府决定于独立的第二天——1月3日，起义军直取天津，由于受了王怀庆伪造南军从秦皇岛发给王金铭的电报的欺骗，缓兵待援，等到1月4日还未见南军开来，才明白是中了敌人的诡计，于是决定当日誓师，发出檄文。下午五时许，正准备登车出发，张建功图穷匕见，踞城叛变，射击第一、二营官兵。王金铭下令还击，双方相持约两个小时。攻城不下，他们决定放弃争夺滦州城，直取天津，率领第一、二营官兵及敢死队员共七百余人，一齐登车前进。当晚十二时许，火车行驶到雷庄附近，突然脱轨。原来，王怀庆已电请袁世凯调了第三镇的第十二标增援，在雷庄设防，拆去一段铁轨，并布置炮队一营，截击起义军。王金铭命令全军下车，与敌军激战约两小时。敌军鸣号停战，派人请王金铭、施从云到雷庄议和。他俩当即答应愿往，众官兵阻止，认为王怀庆诡计多端，恐遭毒手，王、施认为：“如果和议能成，双方免受无谓的牺牲，一直可攻京津，如出意外，以身殉志，求仁得仁，有何憾焉。”⑧大家要求誓共生死，纷纷报名同去，于是王、施率领一百多官兵到了雷庄，敌之伏兵四起，把他们包图逮捕。王怀庆致电袁世凯邀功，袁电令首先杀害王金

铭。

王金铭从容就义，临刑时挺身叉手，大义凛然。清廷统带汪学谦责备他说：“清朝待恩厚汝何故反耶？”王金铭怒斥说：“汝非黄帝之苗裔耶？胡为出此言也！满人以异族入主华夏垂三百年，宰割我土地，鱼肉我人民，凡有血性人人欲得而诛之，何反之有！”^⑨这时王金铭看见他的马弁刘荣在旁边，便对协统陈文运说：“若无罪，可纵之去。”刘荣说：“予随大都督上阵杀贼，今不幸被困，生死同也，都督死，吾何生为！”^⑩遂同时遇害。

王金铭死后，灵柩存于雷庄，一个月后，他的好友连之铎为之移到天津，后来他的胞弟王金钰又把灵柩移到山东，安葬于武城县。

这次滦州起义，被捕而从容就义者三十余人，官兵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者一百余人。^⑪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为王金铭、施从云铸立了铜像，像的基石上刻有滦州起义始末及烈士殉难的经过。以后冯又在泰山为王、施建祠立碑。

（梁 旭 毅）

注：

①冯玉祥著：《我的生活》，天津民国日报1946年5月版，第一本第94页。

②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26页。

③罗正伟：《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46页。

④《直隶起义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77页。

⑤同③，第348页。

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第972页。另见凌铎：《关于滦州起义史实之辨正代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2年10月版，第269页。

⑦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8月版，第152页。

⑧刘骥：《滦州起义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二期第59页。

⑨、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65—366页。

⑪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11页。

撰者附记：本文承山东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资料，谨此致谢。

罗福星

罗福星字东亚，号国权，广东嘉应州镇平（今蕉岭县）大地村人，1884年2月25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南洋爪哇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其祖父罗超六（耀南）为南洋华侨，曾在南洋和我国台湾参加修筑铁路；其父罗经邦，自幼跟罗超六到南洋，因体弱多病，没有固定职业；其母李氏为南洋华侨李某之女。罗福星刚周岁时跟随父母迁回广东老家，六岁启蒙，十岁跟祖父再去巴达维亚，入当地华侨办的中华学校就读。他喜爱历史课，重视体育锻炼，1902年7月毕业。不久，罗福星即随祖父来到台湾，居住苗栗一堡牛栏庄（今苗栗县丰湖村）。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台湾省。罗福星到台后曾在日本人办的苗栗公学校里念过书，目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虐，饱尝奴化教育的痛苦，他对此愤慨不满，产生了反抗思想，萌发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台湾的志愿。由于不满日本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罗福星一家于1906年2月抛弃家产，内渡回广东。归途中，罗福星路经厦门，遇见在巴达维亚中华学校念书时的老师和同学，经老师介绍参加了同盟会，立志投身于革命斗争。

回到广东老家，罗福星在家乡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体育教员。是年8月，由父母主持娶同县的黄氏女为妻。曾在台湾倡建“民主国”开展反割台斗争的台湾绅士丘逢甲，时任广东全省学务公所参议，得知同乡晚辈从台湾回来，十分高兴，经过多方了解，发现罗福星年轻热情，乃聘为广东视学兼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并于1906年底到1907年初派他到南洋爪哇等地考察华侨教育工作。

罗福星到南洋考察华侨教育期间，很受侨胞的欢迎，1908年春被聘为新加坡华侨办的中华学校校长。在那里，罗福星以兴办华侨教育为掩护，向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华侨关心祖国革命事业。这期间，他以中华学校校长身份经常来往于新加坡、缅甸和巴达维亚之间，并担任同盟会设在缅甸的“书报社”书记。

1910年，罗福星从新加坡转到爪哇，担任巴达维亚华侨办的中华学校校长。那时候，孙中山、黄兴和胡汉民等革命党人也曾先后到南洋一带从事发动华侨

参加革命的工作。罗福星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配合，组织胞侨参加革命斗争。

1911年春，同盟会组织领导广州起义，西荷印机关部集结十七人回国参加，罗福星毅然辞去中华学校校长职务，先到香港，潜回广州，参加这次起义。罗福星随黄兴袭击广东总督府衙门，奋勇杀敌。这次起义，许多革命党人献出自己的生命，罗福星也受了伤。起义失败后，罗福脱险离广州，经香港与胡汉民一起去暹罗。虽然伤还未愈，在革命精神鼓舞下，罗福星又去巴达维亚找黄兴，请求分配任务，继续从事发动华侨的工作。

是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罗福星闻讯后即在巴达维亚组织二千多华侨参加民军，立即回国参加斗争。12月，罗福星带民军经上海到苏州，因南北和议已成，新政府又财源不足，民军不得不奉命于1912年2月26日解散，罗福星自己于3月6日离开苏州，经上海回广东老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任大地学校校长。

辛亥革命后，祖国大陆人民更加怀念和关注台湾同胞。许多人提出要派人到台湾去发动台湾同胞赶走日本占领者。福建都督府也计划派人去台湾活动。罗福星知道后，自告奋勇，于1912年12月8再度来到台湾。

到台之前，罗福星于5月间会见了孙中山，表示自己的决心。孙中山鼓励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要决心收复，但得讲求方法。到台后，罗福星注意贯彻孙中山的指示，以台北大稻埕大瀛旅社等处为活动基地，找旧日同游，集结抗日同志，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的革命情形，宣传革命道理。罗对他们说，日本在台湾的施政，“蔑视及虐待本岛人民，课重税，夺产业，使失生计之途”，“今尚不觉醒，则前途将益形暗淡。”而且，“台民系中国人，实无长久屈服于日本之理。应于岛内纠合同志，待机来临，蜂起于各地，杀退日人，驱逐于岛外，以脱离悲境。”^①

罗福星积极联络抗日爱国志士，组织同盟会支部，对外用“华民联络会馆”名义。他和刘士明、江亮能、彭云轩、邱维藩、林达荣等十二人为骨干，称“十二志士”，在苗栗建立领导机关，并派出同志分赴南北各地，宣传抗日复台革命道理，号召台湾同胞勿忘祖国。他们还同当时在台组织“共和联络会

馆”的吴颂贤等人密切配合，共谋大举。

在罗福星等人的努力下，台湾抗日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他们以同盟会为统摄，以华民会、三点会、革命会等组织为外围。为了避免引起日本统治者的注意，各地的组织都用神明会、观音会、父母会、兄弟会、老人会、同胞会等名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台北到台南有九万五千多人入会；大陆也有不少人到台湾参加斗争。他们分散在铁道、邮政等各个部门里，革命情绪十分高涨。

在发展同盟会成员的同时，罗福星还派人同新竹的张火炉、台南的李阿齐、东势的赖来以及南投的陈阿荣等人领导的抗日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大陆沿海各省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同盟会组织联络，以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援。为了便于联络和传递消息，罗福星在同盟会会员和抗日同志之间使用了许多联络暗号，如以“君子”、“杂货”称十二志士，以“母氏”称孙中山，以“婶母”称黄兴等等。

1913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十五日），罗福星等在苗栗召开了台湾同盟会支部的代表大会，动员革命同志做好准备，迎接抗日起义。他们以十二志士的名义发表了《大革命宣言书》，列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后对台湾同胞血腥统治的各种事实，指出：“自日本亡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绝我生命，其苛暴恶政，无所不用其极。”“台湾人民，刻已翻然觉悟，均当以鲜血一洗前此之耻辱矣。”②《宣言书》特别提到，台湾同胞的抗日复土的斗争，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负责人的关怀，得到了大陆人民的支持与配合。

《宣言书》秘密散发台湾各地，受到台湾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许多人捐资筹集起义经费，有些人组织“决死队”，为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广东都督府亦派了革命党人吴觉民到台湾会见了罗福星，两人互披肝胆，各述抱负，决心互相配合共同斗争。农历六、七月间，革命党人黄兴先后两次派人到台湾，了解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情况，转达了革命党和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和支持，给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以巨大的鼓舞。

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武装抗日起义的队伍逐步组织起来，仿照祖国大陆革命党武装的组织形式，设有旅长、团长、排长等职，旅长统率千人，团长

统率百人，排长带领十人。十二志士之一江亮能为司令长，具体指挥起义时的军事行动。

当罗福星他们的抗日《宣言书》散发之后，立即引起敌人的注意。日本在台湾的统治者于农历九月开始，在台湾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逮捕了大批台湾同盟会支部成员和“可疑”的群众，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和拷打。革命党人和抗日群众在敌人的恐怖面前没有退缩，而是坚持斗争。被捕的人在敌人刑庭中英勇不屈，理直气壮地回答敌人说：“我华民与你日本侵略者有仇在焉，非麀杀你们不休止！”“今之国民，亦非昔之中国人可比！何故受汝等日本人主宰也。”③

未被捕的人更没有停止斗争。罗福星他们认为，若停止活动，必致丧士气，人心乱；需要的倒是再接再厉，不屈不挠。10月22日（农历九月二十三日）晚，罗福星等人在旅馆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罗福星表示：“男子以名为重”，“名誉者，吾人事业之支柱也。”“今余即令粉身碎骨，意志仍不屈也，”“余若被捕，虽遭惨酷拷打，必至死不供败坏大局之事。”“若我不幸被捕，我必出以坚强之意志，断不泄漏机密。为革命献身，慰三百余万之同胞，以留功绩于我（中国）政府之历史中！”他一再表示，抱定坚强之意志，为革命而献身。④

罗福星以“救出台民于虎口”为己任，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斗争。在紧急情况下，他给闽省都督孙道仁写了报告，提出要在台湾组织临时联合会，以为大举之用。并说：只是因为自己名字为全岛日本官警所知，搜查极严，事情难办。时局紧迫，全台民之生命危险，我华民为日本人杀害者不遑枚举，请速出兵。

在这期间，罗福星加紧活动，从台北转到苗栗，躲过敌人的搜查以后又再到台北布置下一步的斗争。这时候他得知苗栗打入敌人机关中的革命同志全部被捕，深感到这对下一步的斗争十分不利。他立即冒险到台中、台南各地了解情况。敌人到处在抓人，一时工作无法开展，罗福星只好化装到台北。

12月间，罗福星到了台北后，秘密召集同盟会成员会议，研究如何冲破敌人的恐怖举行全岛起义。但这时敌人要捕拿抗日“首魁”罗星福，正进行挨家挨户的大搜查大检举，抗日起义计划无法付诸实行。罗福星为“暂避其锋”，转到淡水躲在一户农民家里，但终为敌人侦破行踪，于12月18日深夜被捕。这

前后被捕的革命党人及抗日群众达四五千入。

在敌人狱中和法庭上，罗福星仍继续进行斗争。他大声斥责日本侵略者在我台湾的罪恶行径。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待材料的机会，写了一篇“自白书”，分十一项，详细列举了日本官吏虐待我台湾同胞的罪行。他还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信念的诗词和书信，其中激动人心的诗句如：

“独飘彩色汉旗黄，十万横磨剑吐光，齐唱从军新乐府，战云开处阵堂堂。海外烟飞空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轻生爱自由。”“军乐扬扬列队过，天朗风清感慨多，男儿开口从军乐，同唱台疆报国歌。”“东来客族据吾藩，驱逐夷蛮我国尊，白种更传黄祸说，何难今日此争存。”在《祝我民国词》中写道：“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沽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寓语“中华民国，孙逸仙救”^⑤，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

1913年底到1914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者对罗福星和五百多位台湾抗日志士进行“审判”，3月3日，罗福星被处以绞刑，为争回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临刑前，罗福星写了“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的字句，表现出他对台湾同胞的热爱。罗福星昂然走上刑场，视死如归，时年才三十。

（厦门大学 林其泉）

注：

①《罗福星革命案》，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篇第五册。

②汉人：《台湾革命史》第十一章，彭子明：《台湾近世史》第九章。

③同①。

④同①。

⑤罗福星的遗诗，流传的几种文本互有参差。本文引自罗秋昭：《罗福星传》。据王惟英记，此是经于右任校正过的（见台湾“党史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

主要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篇第五册，《罗福星革命案》。

罗秋昭：《罗福星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年版。

汉人：《台湾革命史》第十一章。

彭子明：《台湾近世史》第九章。

《革命人物志》第八集。

陈友仁

陈友仁，西名Eugene Chen,1878年（清光绪四年）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兴梅地区。父亲陈阿金^①早年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海外，辗转 to 英属西印度群岛，先是当剃头匠，后开杂货铺，成为小康之家。陈友仁从小在特立尼达受英国教育，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

1899年，二十一岁的陈友仁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成为当地第一个华人律师。因得到华侨和印度侨民的信任，律师业务进展顺利，不久便自设律师事务所。由于收入丰厚，他曾投资于可可种植园和油田，但仍以律师工作为主。他作风严肃，业余多在家中读书写文章，常向当地报纸投稿。平日颇为关心国际政治和中国局势，曾研读有关日俄战争史料。他虽然只受过西方教育，不懂中文，也不会说中国话，但民族意识强烈。辛亥革命发生时，他正在英国度假，激于爱国爱乡的热情，毅然与马来亚华侨伍连德（1879—1960，著名防疫专家）等结伴回国，并打电报嘱咐其夫人^②携带子女移居英国，以便今后联系。

1912年春，陈友仁回到北京，被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聘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不久施肇基卸任，由于赏识陈友仁的英文，便转介绍他担任新创办的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总编辑。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世凯称帝。当时各报不敢登载梁文，唯有《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陈友仁的胆识也为人们所称道。1917年5月，陈友仁因撰写《出卖中国》一文，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商议中日借款一万万元密约，被捕下狱，本人虽不久便获释，但《京报》被封闭。陈友仁遂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军政府，与廖仲恺等同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9年，陈友仁参加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并游历西欧各国。第二年夏天回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他在上海创办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继承《京报》敢于公开批评时政的传统。不久，为筹措办报经费，他出国到伦敦，嘱其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其全部产业，倾囊办报。